

厘清扩大内需的八个认知误区

□ 陈 龙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创新动能持续增强，但受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推进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和压力，内需不足成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扩大内需的效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厘清八个认知误区，优化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措施。

“单纯投资或消费拉动（主导）”的认知误区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有“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有观点提出要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增长）模式”。这些观点的理论根基是“三驾马车”理论，即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其实这三个方面，体现的是统计意义上的GDP的来源，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相同，也不形成必然的拉动逻辑。中央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直接影响经济循环质量。投资不仅形成即期需求，而且是增长的真动力，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基础，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供给水平，进而决定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消费能力。因此，我们要摒弃那种靠“单纯投资或消费拉动（主导）”的认知误区，从国民经济循环系统的视角看待二者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扩大，是投资的结果。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尤其是总需求的变化，统筹考虑促进投资和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只有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扩大内需战略。

“投资过多、消费过低”的认知误区

投资过多、消费过低，常常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不重视或抑制投资，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影响一系列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国投资之所以占比高，是由我国的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和居民储蓄率所决定的。投资的

高速增长是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如2003—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6%。投资多不多，关键看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资源条件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不能只是简单的国别类比。

此外，还存在因统计口径原因出现的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目前存在的消费不振的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循环质量和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入手，而不能限制投资。扩大投资，其实也是扩大消费需求和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础。2022年，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7%左右。无论是推进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都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投资效率不高”的认知误区

“投资效率不高”，常常成为把脉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来看，单位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逐步下降的。这一趋势与我国资本持续增长的状况相对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这不代表我国投资本身的效率问题。据测算，我国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比较，效率是高的。我国单位GDP增长所需要的投资，不仅比美国、日本或西欧少得多，也比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少。为扩内需、稳增长，需要继续优化投资结构和方式，加大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投资，进一步提升投资效果。同时，处理好房住不炒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关系。近些年来，我国坚持“房住不炒”，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明显减少，成绩来之不易。从中长期基本面看，房地产市场仍然有健康发展的空间，今后需要保持房地产投资的合理规模和增速，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基础设施过剩浪费、空间有限”等认知误区

破除“基础设施过剩浪费”“推进基础设施就是走老路、与高质量发展不符合”“空间有限”等观点，需要从国民经济发展整体来充分认识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基建投资，不仅以总需求的扩张产生经济联动效应，有利于稳定经济运行，而且可以提升宏

观经济效率和改善民生，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总体上不存在过度的问题，反而在制约国民经济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短板。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农民人均公共设施投入仅为城镇居民的1/5左右，投资空间非常大。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不是一个临时、短期的需求管理工具，而是应贯穿于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过程的重要举措。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每个时代的内涵都不一样，不必过度强调新旧之分，但基建内容需要推陈出新，根据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需要及时调整。当前的新基建，大部分属于产业投资范畴，因此，要处理好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投资关系。

“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认知误区

虽然在经济理论中存在“挤出效应”，但这具有严格的前提和条件，并且也与政府投资的方向和时空条件有很大关联。我国的政府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带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在社会投资动力不足、意愿不强的情况下，这不仅不会出现挤出效应，而且能够产生弥补效应和引致效应。一方面，弥补企业投资不足而形成的需求缺口，弥补关系居民生活质量和企业发展环境等方面的投资“短板”，保持合理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间接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产生引致效应，吸引社会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当然，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政府投资方向，使其重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支撑和引导作用，避免政府投资与民争利。

“居民消费与公共消费割裂”的认知误区

在观察和分析扩大消费需求时，不少观点和主张在围绕“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打转转。诚然，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内容，但若仅着眼于此或局限于此，就会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经济是一个系统，消费也不应被割裂。广义上的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等。公共消费不仅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包括基础设施等实体国有资产的消费。从消费视角看，基础设施投资形成未来的公共消费。公共消费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两个方面都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因此，提升扩大消费的效果，一方面要促进居民个人的实际消费；另一方面，要通过公共消费，加快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疏通消费堵点，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带动个人的消费。

“发钱促消费”的认知误区

有观点认为，我国应像一些国家那样直接发放现金，刺激消费需求。这种方法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成本太大，在我国根本不可行。我国的居民消费和储蓄习惯、发展水平等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假如每人发1000元现金，则需要约1.4万亿元，但这对刺激消费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这不仅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和消费意愿也制约了其效果，尤其是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增强，消费更趋保守，这样势必造成宝贵财政资源的低效使用。其实，在国外这一方式也出现了成本过高、效率不佳、浪费严重的诸多问题。从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角度而言，鼓励居民消费，更应着眼于加强社保体系建设，让老百姓有个稳定的预期，解决好住房、养老、育儿、医疗等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问题，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没有政策空间”的认知误区

当前社会上出现“财政压力大，扩大内需，没有政策空间”的观点。虽然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地方债问题广受关注，但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主基调没有变，我国依然具有扩内需的政策空间。我国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地方债的结构问题，但并不构成经济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增长或低增长是我国应防范的最大风险。从实践层面，通过财政政策和资源优化组合，盘活资产，以及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可以释放一定的政策空间。从理论层面，应站在国民经济发展整体看财政空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的实质是增长与风险的平衡问题。能否形成债务风险关键在于债务资金使用的方向和效率。只要债务资金能够使经济恢复或提升潜在增长水平，财源基础得以增强，就不会出现大的债务风险。当然，我们也需要重视防范化解个别地区的地方债流动性风险。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7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加大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这是我们党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针对新形势新情况做出的新的重大部署和要求。保障青年就业是稳就业的重要方面。其中，青年人员慢就业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综合来看，慢就业主要是指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员就业过程缓慢，具体表现为找工作时间相对较长，或者以培训、社会实践等方式推迟就业，或者暂回家中等待就业。慢就业相对于传统的出校门进职场、毕业即就业的模式是一种重要的转变变化，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

理性看待慢就业模式转变的成因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慢就业是技术快速变革环境中青年人员不得不直面的一类风险。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快速的技术变革期，新的、更好或更便宜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向各行各业渗透。新一轮技术变革对不同技能的需求变化具有较大差异性。某些传统行业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自动化技术或机器人取代，从而减少了相关岗位的需求。与此同时，尽管新兴技术领域的就业机会可能会增加，但这些机会通常需要具备新的技能和知识。这意味着青年人员需要更具竞争力的技能和教育背景，或者具备适应新环境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才能在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因此，对于大量没有职场经验或技能匹配度较低的青年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就业困难和慢就业风险。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慢就业是宏观总需求周期性不足所导致的一类群体性就业代价。当前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正处于新一轮货币紧缩周期尾端，紧缩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控制通胀的同时也抑制了宏观总需求，导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口需求大幅下降。我国作为全球货物出口贸易大国，首当其冲受到发达国家紧缩货币政策副效应的波及，外需回落较快拖累经济增长。当外需下降时，出口导向型产业（如制造业、出口贸易）的需求减少，企业可能会减少生产规模或关闭部分生产线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跨国公司也可能会减少投资和招聘需求。这意味着外需不振将导致我国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或跨国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会减少，从而对青年人员的就业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从就业心理的角度看，慢就业是青年人员在经济环境影响下基于自身期望和追求的一种自适性调整。200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青年与之前代际的青年时代相比，面临着大为不同的成长环境和工作心态。新一代青年更加注重工作的个人体验，追求工作的意义和满足感；他们更倾向于从事他们真正感兴趣和热爱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工作；他们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急于就业；他们希望通过工作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弹性工作时间、远程工作或自主创业等方式，以便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当就业市场变得更加紧张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时，这种注重个人体验的心态可能促使青年人员更加谨慎地选择找工作，或者选择“慢充电”等方式“从长计议”，从而延长了他们的就业过程。慢就业可以被视为200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一代对于就业心态的自适性调整。

谨防“慢就业”成“不就业”或“躺平”

谨防“慢就业”的青年人员变成“沮丧”的青年人员或“躺平”的青年人员。尽管慢就业是一种毕业后找工作的过程相对缓慢或困难的情况，如果任由其发展可能导致青年人员感到沮丧（认为找不到工作而放弃找工作）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产生多方面影响。如果大量青年人员因找工作过程漫长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不仅形同人力资源浪费，还可能产生一定的家庭和社会隐患。慢就业的青年人员可能不需要依赖家庭支持或陷入财务困境，这不利于提高青年人员的婚育意愿。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就业对于青年人员来说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来源，也是个人价值和成就感的体现。当青年人员找不到价值或找到的工作与自己的期望不符时，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从而产生“躺平”情绪。

青年人员是国家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促进青年人员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青年人员的潜力和创造力，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青年

青年人员『慢就业』及其治理

□ 陈建伟

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在技术、科学、文化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而通过创新和创业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因此，促进青年人员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助于极大激发创新和创业活力。此外，促进青年人员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当青年人员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并获得合理的收入时，他们会更加满意和稳定地参与劳动市场，减少社会不满和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以积极就业举措缓解慢就业难题

缓解慢就业难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青年人员更好地规划职业发展，提高就业的成功率和职业发展的质量，从而降低慢就业的风险。

一是加快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校企合作，不断增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青年人员的受教育年限普遍较高，但是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制约了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适应性。因此，要以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引领加快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包括各级各类的入学选拔机制、专业化培养体系、职业规划培训等一系列内容都要以增强就业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为参考。与此同时，要支持学校搭建平台深入推进校企合作，让学生有机会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不断夯实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能力基础。

二是完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增强就业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政策的协同性，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就业吸纳能力，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面临宏观总需求周期性不足和外需不振的经济环境，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在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时，要将就业指标纳入政策制定的考量范围，确保各项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就业容量增长和就业质量提升。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对新兴产业和创新领域的支持，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特别是在高科技、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为青年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要完善创业支持政策体系，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和创业资金等支持措施，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鼓励和支持青年人高质量创业带动就业。

三是推进劳动力市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速就业信息的公开和流动，为青年人员提供及时的就业岗位信息和职业发展指导。政府就业指导部门需要加强与学校、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合作，建立数据共享和合作机制，获取更全面准确的就业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政府可以协助青年人员更好地了解就业市场的需求和趋势，为青年人员提供更精准的就业信息和职业发展指导。政府可以通过多方合作机制，鼓励企业及时提供招聘信息，组织招聘活动、职业咨询会等，为青年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指导。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上接1版）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好经验好做法，聚焦强功能、扬优势、补短板，开展村（社区）党组织分类定级，巩固先进、提升基本、整顿软弱涣散，推动基层党建全面提升、全面过硬。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施村（社区）党组织“六强六好”功能提升行动、薄弱村千村提升攻坚行动等一批专项行动，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效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以增强人才支撑力为目标，不断厚植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人才优势。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创建，因地制宜布局一批特色产业人才集聚区。加快完善生态、计划、平台、服务“四位一体”人才工

作格局，大力引进培育海内外高水平创新人才，组建“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人才攻关联合体，设立高层次人才事业编制“周转池”，强化人才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切实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中来。

深刻把握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任务，坚定不移扛起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责任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一份载入史册的光荣，更是一份重如千钧的责任。

必须牢牢扛起这一重大责任，对照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全面从严治党7项重大任务，结合组织部门职能职责狠抓落实，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健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的干部工作体系，健全严把入口、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党员管理体系，健全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体系，健全党的组织工作制度和经常性监督，突出抓好主要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重点领域和重点岗位干部的管理监督，着力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主动把党员队伍建设重心放到加强

落实从严管理干部“五个要”重大要求，加强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突出抓好主要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重点领域和重点岗位干部的管理监督，着力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主动把党员队伍建设重心放到加强

教育管理、提高质量、发挥作用上来，完善发展党员政治素质联审联查机制，健全不合格党员处置机制，探索不同群体党员管理的有效办法，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完善党建考核、述职评议、督查检查等机制，推动各级党委（党组）扛起主责、当好主角、抓好主业。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抓好组织部门自身建设，持之以恒从严治部、从严律己、从严带队伍，不断深化政治机关建设，推动组工干部坚守公道正派、增强履职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永葆清廉本色，持续打造“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模范部门、过硬队伍，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作者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